

当代中西方规范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德法之道

靳凤林

摘要: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商关系“亲、清”两原则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时代政商关系抑或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探讨日渐深入。由于中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认知态度各不相同,致使其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形同质异,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迥然有别。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运演机制面临更加复杂的伦理挑战:就数字权力资本化而言,它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就数字资本权力化而言,也同样生成了类型各异的表现形式。为求解这些难题,必须对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底线道德、伦理规则和法治原则进行深度理论辨析,正确处理好三大问题:以何种态度对待弱势群体是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道德前提,持续构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不断增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法治保障。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和求解新时代我国政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遇到的各种难题。

关键词: 中国;西方;政商关系;德法之道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3-0090-11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来,如何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再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1]众所周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如学科层面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宏观层面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观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微观层面官员与商人的关系等。这些不同的形态在国内外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被统称为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无论是当代中国还是现代欧美国家,如何处置由权力与

资本构成的政商关系,都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要科学把握政商关系的客观历史规律及其在当代世界的深层运演逻辑,就必须对中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认知差异予以深入探究,并对双方政商之间出现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路径与方法探赜索隐。在当今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中西方处理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伦理规则更是呈现出极端复杂性特征。基于对上述诸种因素的综合考量,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对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抑或政商之间良性互动的德法之道予以深入探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当代中西方处置政商关系的三重伦理视差

要全面透视中西方处理政商关系的伦理规则,就必须对双方关于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认知予以

收稿日期:2023-12-03

作者简介:靳凤林,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北京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 100091)。

深入探究,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对市场经济中双方出现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根本性质做出科学判断。

1. 中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界定各不相同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指通过市场手段配置各种经济要素,以求获得最佳效率的过程。相比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至今为止效率最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具有原始分配的客观公正性,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科技发展、分工协作的水平,也重塑了人类全新的道德文化类型^[2]。但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存在重大差别,其所孕育出的市场经济类型及其对市场经济性质与作用的认知也就各不相同。

第一,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界定。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指称的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它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为代表,特别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个人财产权的极端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主张国家尽可能减少对私营企业的干涉,在国内外实行自由贸易,让劳动力自由充分流动,让市场发挥最大的调节作用,如曼德维尔在其《蜜蜂寓言》中所言,只要每个人竭尽所能去追求私利,就一定能带来社会公共利益的繁荣昌盛,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巨大繁荣。但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此种模式的弊端日渐显露,直到20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大危机的出现,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干预理论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是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型代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并解决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部分弊端,但却导致了经济滞胀的长期存在。

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扑面而来,他们要求回归亚当·斯密的原典性自由主义理论,故被称为“保守论自由主义”,以便区别于凯恩斯的“修正论自由主义”。保守论自由主义更加笃信自由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根本作用,主张把全部国有资产私有化,重视知识产权在价值创造中的极端重要性。为了充分激活资本力量,国家税率向富裕阶层倾斜,极力打压与大资本集团持续博弈的工会运动,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改革措施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具体例证。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蔓延开

来,包括美国推动拉美各国的私有化运动,特别是给俄罗斯的叶利钦政府开出的“休克疗法”,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变种,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

从本质上讲,新、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主张效率至上,以效率促公平,坚守丛林法则,较少考虑企业对社会正外部性补偿,更不愿担负企业负外部效应引发的各种社会责任,任凭市场摆脱国家和社会的“加持”去自由狂奔,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不断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3]。2020年以来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更是将欧美国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矛盾暴露得淋漓尽致。

第二,中国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界定。与西方相反,我国改革开放后,先后采取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直到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二战后罗斯福新政实施的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模式,更不同于后来的各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其根本特点是将温和的党政一体化的政治集权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积极干预经济,为促进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生成提供强有力的引导和支持。

我国之所以采取这种市场经济模式,主要目的有三点:一是迅速摆脱长期性计划经济模式导致的经济不平衡和国民财富增长缓慢局面;二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避免市场经济运行中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三是通过一部分人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努力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整体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是不断加大民生和社会保障投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占比,大力开展全社会的扶贫工程建设,通过制定各种反垄断措施,有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资本正视和补偿国家和社会的正外部性作用,减少企业自身的副外部效应,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置于国家进步和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中予以考量,最终实现资本、权力、劳动

抑或市场、国家、社会的动态平衡,从本质上看,这种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更加注重公平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在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中推动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2. 中西方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存在形同质异的根本区别

搞清了中西方对市场经济特质的不同认知,就为深入探讨权力与资本的伦理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平台。中外学界在权力与资本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形成了歧义纷呈的理论派别,例如,政治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利益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理论、制度安排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无论何种理论都承认,作为权力一方的国家、政党、政府等组织机构和官员,都是资本或私营企业一方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利益竞争、行业发展等各个环节。例如,通过政府立法补救市场失灵,通过政策制定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生产,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企业投资,通过干预国际贸易缩小收支逆差等。但上述国家、政府、政党力量的无限膨胀,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等权力资本化现象的不断蔓延。需要指出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资本化更多的是通过所谓“合法性”政商勾结方式得以实现,它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始终的必然产物,而当代中国的权力资本化主要通过隐蔽性、分散性的官商勾结形式得以完成,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偶遇性衍生物,二者之间存在着形同质异的根本差别。

第一,西方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就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权力阶层主要由国家、州、市各级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工作人员构成,其中的政务官员通过定期选举产生,事务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公务员考核才能获得终身任职资格。西方的定期选举制度决定了权力阶层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对选民负责,特别是各级政务官员要及时回应选民的具体要求,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为规范,绝对不敢接收选民或企业家的直接贿赂,这给世人留下了西方国家各级官员高度廉洁的直观印象。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西方政治生活内部,细究其内在运作机理,认真分析各级官员从政前后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其本真面目远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表层现象复杂万分。

欧美国家权力资本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以下

几种:一是各级官员在职时通过手中权力对特定企业予以或明或暗的关照,一旦任职期满,特别担心这些曾经得到过自己照顾的企业高管离开原来的公司,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到这些企业发表演讲,这些企业也会投桃报李,给予高额回报。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任职届满后,连接到华尔街的高盛、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发表演讲,每场演讲费都在20万美元以上,并大肆颂扬和百般献媚华尔街金融高管们的杰出才能,称美国广大民众为“屁民”(little people/the unwashed mass),让人脊背发凉。二是美国很多高级政务官员任职前就在某些大型私营企业或具有企业性质的律师事务所、著名研究机构工作,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后,必定会给予原有主雇或关系密切者心照不宣的帮助,一旦离职,就立刻通过“旋转门”回到原有公司或被相关机构聘用,获得高额薪酬回报。如特朗普政府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曾是美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小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卸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后立即成为某医药公司的董事。三是离职后的总统和知名政客纷纷成立个人基金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曾经扶持过的相关公司的巨额捐款。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基金会只要按照章程做出适当的慈善事宜,就可以获得免税权,而基金会的行政经费及工作人员薪酬,均可从基金中列支。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成立的基金会,其主席就是其女儿切尔西,这一基金会本质上就是克林顿夫妇的“小金库”。四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以帮助重要利益集团将非法的东西合法化或者将合法的东西非法化。以医疗领域为例,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鸦片类毒品当做止痛药物列入处方药,致使众多患者用药上瘾成性,这实际上是变相售卖毒品,致使美国毒品交易泛滥成灾,而医生和药厂却赚得盆满钵满。美国社会具有处方权的医学博士少之又少,但美国人口在过去20年增长几千万,而医学院校的本科和研究生招生数量被法律严格限制,医疗利益集团就是要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故意制造医学人才紧缺,将国民视作医疗利益集团的人质,随时通过社保、保险等途径予以高价勒索。

从以上美国权力资本化的有限例证中不难看出,虽然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权力披着为选民服务和清廉从政的华丽外衣,但本质上是按照资本逻辑的要求高速运转的强有力工具。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强大的资本利益集团面前,都缺乏基本的政治自主性。只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赖以生成的私有制不变,权力资本化现象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且无法

得到根除,其终极命运只能伴随一场接一场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消亡。

第二,中国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就当代中国权力资本化现象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整个国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代表资本力量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党反复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但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权力对资本的支配地位,同时也为权力资本化提供了各种操作空间,致使权力资本化导致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特征。

这种腐败现象最为常见的形式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借助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登记、行政认证等手段对民营企业吃、拿、卡、要,伴生各种类型的“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二是凭借公共权力在协调企业关系和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心安理得地享受企业奉送的礼金与财物,特别是借助政府支持和参与的各种重大投资项目,帮助亲属、朋友扩张企业实力或安插亲信、营私舞弊、变相掌控,乃至官员本人或亲属到企业拿“干股”“暗股”“搭股”,通过高位套现形成官商之间的利益同盟或依附关系。三是通过乱收费、乱摊派等手段,模糊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将权力的公共价值套现为特殊的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四是借助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垄断市场,排斥竞争,将社会财富积聚到少数部门或少数人手中。这仅是对当代中国权力资本化的具体形态所作的粗线条说明,每位学者可以依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进行不同的类型划分。

但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权力资本化现象的出现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设计南辕北辙的,更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它只是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条件下的衍生物。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政党自主性,不会被资本利益集团所左右,随着执政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一系列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行动的持续开展,特别是伴随市场经济制度的日渐完善,它最终会得到有效遏制。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它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资本化有着根性差异。

3. 中西方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迥然有别

权力资本化只是中外政商关系互动中呈现出的一个侧面,而资本权力化则构成了中外政商关系的另一重要面相。如同权力本身在不受制约条件下具有自我膨胀的本性,资本同样会在边际效益最大化的激励状态下,使出浑身解数去俘获权力,并使其为之服务。因此,要系统诠释中西方政商关系的伦理视差,不仅要研究中西方权力资本化的异同,更要探究中西方资本权力化运演机理的本质区别。

第一,西方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就西方国家资本权力化的基本途径而言,西方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深入把握各类游说公司的巨大作用。由于游说活动在西方被视为言论、集会和请愿自由的一部分,因而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如美国华盛顿市西北区的 K 街就聚集了大量的游说公司、公关协会、智库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曾经在国会或华盛顿特区长期工作,或者与国会议员及总统身边工作人员存在特殊关系,他们在大大小小的企业或行业协会资金支持下,代表各种利益集团来影响国会议员或政府的工作,从立法、听证、表决、执行、监管等各个环节,诱使或促成国会及政府官员做出有利于某个企业或行业的决策。二是企业通过网络、报纸、电视、杂志等各种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价值信仰,包括推送企业形象广告、倡议广告、慈善广告等各种传媒手段,迫使议会或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企业或行业的公共政策。三是在企业内部或所在社区培养选民,要求并鼓励员工或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向立法机构或政府反映意见,在竞选时推举为企业利益服务的各级议员或政府官员。四是企业或行业协会通过深入调查来撰写各类研究或咨询报告,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或在各种听证会上提供证词,以便影响各类法律制定或政府决策等。五是在各级议会或政府领导人选举中,直接捐款或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其竞选活动宣传造势,一旦竞选成功,再通过政治分肥制或各种渠道满足企业或个人利益,甚至各类企业家直接参与国家和地方的议员或政府官员选举^{[4]303},特朗普以大商人身份当选总统就是典型例证。

不难看出,欧美国家资本权力化的本质就是资本利益集团用金钱兴办和资助各种组织或政党,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参与议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或直接参选领导人,把资本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所谓三权分立式“民主政治”,本质上是资本利益集团在公

共权力运作中的全过程博弈,它必然导致各种利益集团拼命争夺选民,最终引发广泛的社会撕裂。可见,欧美国家的资本权力化受到国家法律的直接保护,具有结构性与整体性特征,是一种制度化的利益输送机制,是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密不可分的必然产物。

第二,中国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就当代中国资本权力化的具体路径而言,中国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营企业家作为半官方的行业协会成员,通过各种活动参与政府政策制定或帮助政府起草行业法规和行业标准。二是通过向政府负责的公益事业机构捐款捐物、雇佣下岗工人或残疾人,从利益与情感上影响政府决策。三是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向政府部门和官员开展游说、递交研究报告,帮助其分析国家经济或企业发展趋势,希望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充分重视其合理诉求。四是企业将自己的经营内容与政府政绩及官员偏好、意愿相联系,增加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关联性和依赖性。五是私营企业家通过经营业绩努力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借助各种提案影响政府决策,但中国的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绝大多数是兼职,而非西方参众两院的专职议员。六是 enterprise 通过直接给政府官员送礼、经常性拜访、免费请其旅游等行贿方式,笼络政府官员暗中为其服务等。

与欧美国家资本权力化过程中官商之间的“交易”型特质有很大不同,中国私营企业家倾向于和政府官员建立一种私人关系,以之作为私人资本来发挥作用,这就使得中国私营企业家偏好于采取单独的而非集体的政治行动,也不轻易拿出自己的“关系资产”与他人共享^{[4]304}。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任何私营企业家皆有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可能性,但要弃商从政,升迁至省部级或国家级重要领导人几无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私营企业在资本权力化过程中引发的腐败现象只涉及少数官员、小集团和个别机构,因为不法商人与贪腐官员的勾结通常是独立运作的,具有离散性特质,而非制度性或整体性现象^[5]。加之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政权赖以存在的直接经济基础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各类大中型国有企业,它完全不同于依靠各种私人资本集团的政治献金来维系生存的西方政党,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更不是单纯为个别私营企业服务

的人质,其本身具有强大的政治自主性和道德自律性,明白自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任何违背这一根本宗旨的党员干部一旦被查出,必然会被清理出执政队伍。

二、数字经济对中西方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伦理挑战

数字经济主要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并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对权力和资本的组织形态和实践样态均产生重大影响,就国家与政府的行政权力而言,它使国家和政府的行政权力主体日渐多元化,某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数字技术获得原本属于国家机构的支配和操控能力,其所形成的“数字空间”极大地拓宽了国家和政府原来支配的地理和物理的“疆域空间”,重塑了国家和政府原有的结构、职能和行为模式,使其从科层制静态管理走向网络状动态管理,国家对数据的“聚、通、用”及其利用数据进行决策、执行、监督的能力成为权力使用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就市场经济中数字资本的重大变化而言,与传统的人力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相比,数字技术引发的人工智能革命重新建构了人类世界的经济版图,数字资本及其所构成的数字资本阶层对知识与技术的渴求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资本形式,特别是数字资本颠覆性地创新了资本增值的崭新模式,各种网络平台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流量变现赚取巨额财富,电子商务、跨境店商、网络营销成为新型的经济产业。正是数字经济条件下权力与资本的快速发展,对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之间彼此互动的伦理规则带来一系列新型挑战。

1. 就数字权力资本化而言,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

第一,基于公共服务型的数字权力资本化。由于当今时代数字企业涉及的众多业务内容与政府的公共事务存在重合性,而地方政府在本地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经济决策总部署的重要功能,为了大力促进辖区内的经济发展,政府会通过各种优惠和变通措施,来帮助本地发展的数字企业规避、悬置、利用各种国家和政府的规章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数字企业的快速成长。但与此同时,也会使地方政府与数字企业合谋,伤害到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

特别是某些大型数字企业为了垄断某地市场,从中获取超额收入机会,会向当地政府部门的监管者大肆行贿,使得政府监管部门“公器私用”“靠网吃网”,将权力的公共价值套现为个人或部门的利益。

第二,基于媒介干预型的数字权力资本化。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借助数字企业所独有的隐蔽功能来为其选举政治提供重要服务。因为政客们发现,在数字资本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干预数字平台的运作比直接干预选民更有效力,他们可以利用数字平台对参与选举的公众意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力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如美国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个秘密项目,即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互联网服务公司对美国互联网用户的数据信息进行抓取,继而满足并服务于决策者的权力需求。实际上在美国近年来的历次总统选举中,各个竞选团队都在利用互联网公司的信息,精准投放文章、视频、广告等,促使立场摇摆的选民倒向自己一边,从而深刻影响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6]。

第三,基于国际霸权的数字权力资本化。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强化了全球数据鸿沟,西方主要大国依靠其政治、经济、军事等超级霸权,将其与数字企业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摆脱传统国际法的限制,大肆开展信息搜集、数据处理、信息分发行为,乃至通过自己设置的市场规则、知识产权、舆论导向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支付巨额费用,全面垄断国际公共领域的话语权。而众多后发国家由于缺乏与之抗衡的技术优势和数据储备,只能沦为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特别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不断打压其他国家的数字高科技企业,堂而皇之地在世界各地进行数字量化活动,不断搜刮世界各国的各种数据,仅美国谷歌在全球就设有36个数据中心,致使全球大量数字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

第四,美国政府广泛利用一些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大肆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传播手段主要包括:控制网络传播渠道、设定网络传播议题、主导网络信息走向等。特别是输出具有鲜明双标特点的新自由主义、保护主义、排他主义典型话语,持续发布各种错误信息,有意过滤或操作各种信息,以便凸显或弱化某些政治观点、政治议题和政治人物,达到控制他国政治议程的目的,借此干预别国内政,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巩固本国的霸权地位,形塑了一种崭新的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领土权

力逻辑^[7]。

2.就数字资本权力化而言,生成了类型各异的表现形式

第一,从资本与劳动关系角度看,数字经济催生了零工、众包等不稳定的就业形态,使人类的劳动组织形式、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劳动异化和资本剥削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就劳动异化而言,在数字资本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只是数字劳动的异化形态更加复杂多变,包括数字劳动与劳动者自身的异化、与劳动工具的异化、与劳动对象的异化、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等。特别是占据数字资本产业链顶端的大型平台企业,通过全球性分工合作,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资本积累的链条之中,实现了对全球劳动力的数字化剥削。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在内的大型跨国数字垄断平台,正在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全球数据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乃至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从中俘获全球数据资源,深度榨取全球生产性劳动者创造的各种剩余价值^[8]。

第二,由于个人或政府对数字经济中的要素资源产生依赖而使数字资本的权力边界不断扩张。就个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一旦习惯于将时间和数据投入某个数字平台,这个数字平台就会不断向其推送相关的新闻、短视频、社交信息等,使得消费者对该数字平台产生“黏性”,打造出一种“上瘾”经济。该数字平台也会通过算法技术针对特定消费者推出定制产品,使其不断收到自己想要的各种信息,逐步沉溺到数字资本打造的理想国中而无法自拔。个人一旦想更换平台,就会失去在该平台上建立起来的数据、联系人、聊天内容以及各种个性化设置,从而付出很大代价。就政府而言,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政府的很多公共服务职能与数字企业的技术优势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迫使政府机构将越来越多的服务外包给各种数字企业,其对数字企业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再加上政府利用数字企业提供的数据可以更加便捷地设计公共政策,提高地方政绩,因此,伴随政府对数据技术的依赖不断加强,政府权力会逐步被削弱和分割,政府对数字资本的监管也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数字资本是一种新生事物,在相关法律政策尚未健全时,一旦数字企业变得足够强大时,监管机构可能会被迫改变法律去适应数字企业的需要。可见,数字资本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公共服务的同时,其与公共权力的勾连

纽带变得更加隐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9]这充分表明:个别腐败官员公权私用,为不具备特定市场准入资格的数字资本大行方便,为部分平台企业降低上市门槛,拉低市场整体水准;而数字资本则凭借权力加持,大肆扩张增值,甚至有组织有预谋地搞不正当竞争,从中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第三,伴随数字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它可以借助其庞大的用户群,动员用户和与之利益相关的人员向政府争取更多更大的权力。数字资本在不断壮大自身的过程中,为了确认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从而确保长远性根本利益,其会通过收购和建立具有一定公共空间属性的传媒或新媒体网络平台,来有效引领时尚潮流,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世界观的形成。而每一个公民自身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其可以在具有公共属性的数字平台上行使自己的权利。一旦大量普通公民的意志被资本逻辑所绑架,就可能跟随资本的本性而去追逐最大的私人利益,从而扩大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进而给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诸多困难。在当今社会,有很大一部分数字资本活跃于网络社会文化领域,他们通过创办各种各样的网络空间来弘扬网络参与文化,从而有效影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彼此交往的传统模式,创生出各种新业态。从中不难看出,数字资本能够以尤为隐蔽的方式介入一个国家内部的微观生活之中,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解构各种公共权力,从而造成社会去中心化的假象,使得公民个人权力向公共权力的过渡陷入数字资本设置的巨大陷阱之中。

第四,基于数字资本跨国流动的快速易变性,它可以轻松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从数据霸权、技术霸权到资本霸权的全面性权力扩张。数字资本具有的全球流动性使其能够轻松突破传统主权国家和国土疆域的限制。数字资本在促使全球联系更加紧密的同时,也在借助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本的最大权力化,通过建立数字帝国来掌控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情报,在其版图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让整个世界通过智能手机、平台软件以及各种数据流形成一个庞大的无形网络,数字资本正是借助这一网络成为凌驾于全球人之上的支配性权力^[10]。以美国优步公司为例,它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通过建立全球商业网络在国际上占据垄断地位的目标。为

此优步不惜利用长时间的亏损来积攒足够大的用户规模和用户密度,不断提高用户“黏性”,在世界范围内铺展自己的业务。当各国政府的公共事务不得不依赖其丰富的数字资源和高端技术时,就会导致这些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占据霸权地位。因此有学者指出:“平台日益成为掌握支配权力的社会组织,逐步进化为看起来像是国家的现象级政治物种。”^[11]

通过上述对数字权力资本化和数字资本权力化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伴随现代科技进步和生产水平水平的不断提升,海量数据成为创新权力与资本关系的重要元素,包括:数据的生成、传递和获取能力,大数据信息数量和信息广度呈现出的异构性特质,多维信息的交互能力和共享能力等。正是上述海量数据的快速流变引发更多社会主体进入政治和经济创新者行列,这就必然要求及时协调各种生产关系,特别是要对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上层建筑进行适时调整,包括不断突破不适用于新业态的旧有法律,加快建立尊重创新、灵活高效的法律体系。政府不能把自己设定为部门利益的捍卫者,更不能与数字资本结盟去侵蚀公共利益。特别是面对数字资本全球产业布局的大趋势,更要牢固确立和平、发展、公平、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大力优化数字治理的国际环境,努力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统筹谋划数字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多层面协同、多平台支撑、多主体参与的数字领域合作体系。尤其要高质量搭建数字领域开放合作新平台,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等相关国际规则的构建。其间,要高度重视国家间数字资本的贸易对话,努力建设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政策框架、管理体系,提升全球经济运行的效率与韧性,让数字经济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三、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 良性互动的德法之道

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和欧美国家处置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三重伦理视差,特别是对数字经济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运作面临的伦理挑战予以仔细检视,最终目的是要总结和归纳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德法之道。要高质量完成这一理论任务,就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大问题。

1. 以何种态度对待弱势群体是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道德前提

在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利益博弈过程中,

劳动阶层的利益诉求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较低,维权技能较差,参与决策的机会较少,很容易出现权力与资本彼此勾结而深度侵蚀劳动利益的局面。从这种意义上讲,如何正确对待劳动阶层的利益诉求,是检验权力与资本能否良性互动的道德试金石。著名经济史家波兰尼在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前,权力、资本、劳动之间是相互契合地黏连在一起的伦理共同体,但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市场乌托邦开始将劳动、土地等一切生产要素转换成商品交易的对象,资本试图摆脱权力与劳动的束缚,从三者彼此镶嵌的状态脱离出来,进入自由放任的疯狂运动之中,并转身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来改造权力与劳动,但权力和劳动决不会甘于资本的摆布,它们必然会做出自我保护性反向运动。就权力而言,它会在需要经济繁荣时加大油门刺激资本的活力,需要照顾行动迟缓的弱势群体时又会通过刹车制动装置来延缓资本的运行速度。就劳动而言,它同样会通过此起彼伏的工人、农民运动和福利诉求来节制资本,迫使三方在动态博弈中不断达到更高层次的稳定状态^[12]。正是基于上述认知,阿马蒂亚·森针对发展中国家劳动阶层的经济贫困、社会福利和集体选择问题,强调指出,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等,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意愿来生活的能力^[13]。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通过对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正义观的深入剖析,设计出“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理论,提出制度正义两原则,即政治上的自由优先性原则与经济上的照顾最少受惠者利益的差别原则^[14]⁵⁶。不难看出,上述欧美思想家共同强调,无论是面对国内的阶层不平等还是全球的地区不平等,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与资本在彼此互动中,对基本人权的尊重都具有高度的优先性,都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阶层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只有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我们才能在这个地球上实现永久和平与繁荣。无论欧洲福利国家依托收入转移进行贫困治理,还是美国力图基于个人进取和市场化方案推动减少贫困,均是解决社会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果说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在力图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通过权力来规范资本运作,通过劳动来节制资本获利,那么,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世界无产者的自

由联合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科学评价了资本及其人格化代表资产阶级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时又深刻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资本论》中,更是通过对资本在生产、交换、分配、流通过程中如何榨取劳动阶层剩余价值进行了精细说明,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点,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注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一制度体系的根本目的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它超越了政党执政的功利性,贯彻了政党执政的人民性与正义性原则。特别是中国近年来的超常规脱贫实践,一方面通过国家的政治议程形成了调动全社会力量来改善民生的历史格局,另一方面又突破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约束,采用“书记挂帅”“建档立卡”“精准施策”等一系列措施,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各种问题,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底层劳动群体的基本收入和福利水平,有效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历史性地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从而确保了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15]。

2. 持续构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密不可分两个方面,无论其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性质如何,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内在逐利趋势很难彻底根除,只不过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表现形式、发展程度、求解方式各不相同。但只要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能够牢固确立善待社会弱势群体的道德底线意识,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面建构起公平正义的伦理规则,就一定能够实现权力与资本的良好互动。

第一,在宏观层面要通过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实现国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效率(efficiency)一词在微观经济学中主要指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即边际产品的比率与要素价格比率之间均衡关系的实现,在宏观经济学中主要指对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和量度。与效率概念的确切性相比,“公平”一词在东西方文化中从来都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与其对应的英文词是 justice,在

很多情况下,公平与正义、平等、公正等概念可以替代使用,其所指称的是一种关系范畴,即社会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状况。透过中外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各个学科围绕国家与市场关系展开的各种争论看,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对效率与公平追求的重点各不相同,呈现出一种不断流变的历史动态过程。当社会急需增加财富时,效率原则会占据主导地位;当社会利益冲突的增加影响到财富增长时,公平原则就会唱响主旋律;当财富增长和利益冲突同时出现时,它们会一并成为社会伦理思维的主旨,此时就需要对二者进行综合平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摒弃抽象谈论国家与市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轻重、先后,而要在结构性关系和综合平衡中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市场经济机制充满了竞争风险,必然存在胜负之分,胜者在财富分配中会不断获得红利,败者的财富则不断减少和缩水,出现贫富差距是必定无疑的,但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导致部分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必然引发社会动荡,社会的整体财富也将受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追求的公平更多地体现在参与竞争过程的公平,而不是分配结果的公平,合理性差别的存在恰恰是公平的本质要求,否则就等于平均主义。当然,全面性社会公平还包括政治参与、社会权益等内容,这是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规则所无法承载的,它要求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综合协调作用,需要国家通过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等手段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弊端。就当代中国而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能够跃居世界第二,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高度重视经济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而效率的提高是竞争获胜的根本手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两极分化,在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今天,必须把社会公平建设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看待,特别是要通过建立公平正义的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体系,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第二,在中观层面要通过权利与责任的统筹兼顾确保政府与企业的和谐共处。如果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代表了权力与资本彼此互动中宏观层面的内容,它需要通过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来发挥价值理念的引领作用,那么,在中观层面则需要政府与企业的权责兼顾来完成权力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与企业从来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翼”:政府一旦脱离企业的支持,就难以实现社会

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国民生活的幸福安康,必然陷入政局不稳和社会混乱的贫穷落后状态;而企业一旦离开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将难以为继。即使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创始人亚当·斯密眼中,作为“守夜人”的最小政府也是保证国家安全避免他国侵略、维持社会秩序免遭暴力侵害、维系公共事业和建设公共设施必不可少的存在物,没有这些正外部性作用的发挥,市场机制的常规运行将无从谈起。当然,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企业,或企业可以不受约束地影响政府,而是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划定明确的权利与责任界限。就政府而言,其所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善”,政府的根本作用是通过完善机构设置、创新监管方式、提高公信力等措施,来为各行各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为市场运行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包括建构企业的声誉市场、股票市场、经理人市场等。一旦市场失灵,政府就要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控制自然垄断,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措施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企业而言,其所扮演的根本角色是物品提供者,要通过满足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需要,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当然,企业可以通过政治表达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但必须遵守正义性伦理原则,要主动担当起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责任,即企业所采取的行为必须是正当且符合社会的道德伦理要求,尽可能减少各种负外部性效应,在企业行为非故意地给他人造成损害时,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合理补偿。当然,在当代中国特定背景下,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还要担负起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义务,并努力创造国有企业和其他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4]402}。

第三,在微观层面要通过公德与私德的亲清界分促成官员与商人的各司其职。如果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从价值理念层面影响着权力与资本的良性互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通过权利与责任的统筹兼顾,从制度伦理层面确保权力与资本的和谐共处。那么官员与商人则要通过公德与私德的亲清界分,来促成权力与资本的各司其职。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明确指出,任何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只有外化到社会制度结构之中才能为人所遵守,与此同时,还要内化成人类的正义性思想情感和目标志向,才能保证制度结构的长期稳定运行^{[14]381}。厉以宁也认为,要从制度层面实现

政府和企业的和谐共处,官员和商人的习惯与道德同样不可或缺。他说:“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留下的空白只有依靠习惯与道德调节来弥补,习惯与道德调节是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16]可见,官员和商人的职业道德状况对权力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同民营企业企业家座谈时,多次提及建构亲清政商关系问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企业家职业道德的极端重要性。就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牢固树立责任伦理的道德要求,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肯于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广大企业家群体中去了解他们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认真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反映和诉求,积极做到靠前服务,善于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企业家打交道时,要守住底线和把好分寸,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决不允许对民营企业企业家吃拿卡要和贪污受贿。就民营企业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方式跟政府官员打交道,通过正当渠道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实事求是讲真话,本本分分建真言,善于通过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健康成长,树立良好的企业家形象,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百姓幸福担当起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所谓“清”,就是要求民营企业企业家光明正大搞经营,在与领导干部交往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树正气,走正道,有效避免政商关系的不清不白,要懂得以义制利,通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去合理合法地追求企业利润^[17]。

3. 不断增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法治保障

道德和法律都具有规范权力与资本关系的重要作用,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要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既要高度重视道德伦理的潜移默化作用,更要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作用,只有实现道德与法治的相辅相成,才能确保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当代中国尽管已经颁布诸多约束领导干部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和规范企业商业活动的法律法规,但面对政商关系处置不当引发的权力腐败蔓延和资本逻辑盛行,亟须制定和出台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专业性法律法规,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边界,为新型政商关系的确立奠定法治基础。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为了实现政治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既要引导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公平竞争、统一市场、有效监管,又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正、稳定、可预期的

法治环境。

第一,从国家、政府和官员层面看。要深刻理解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特点和市场发展趋势,以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为导向和指引,在与市场深入沟通基础上,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形成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维护稳定有序的市场秩序,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各种资本要素健康发展。在健全市场法治过程中,要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有效避免“立法过严、违法普遍、执法不纠、法外特权”现象的蔓延。特别是要厘清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根据权力分布确定责任清单,根据责任清单建立责任认定和评估制度,要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公开列明法律规定禁止的事项,对于清单之外的事项,要由市场主体自行处置。与此同时,又要牢固树立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根本宗旨,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向纵深方向发展,避免不作为、不敢为、不会为和办事难、办事繁现象的发生。政府官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促进增长、保障就业、活跃市场、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权力任性,把中小企业当“韭菜”割,不断地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持续恶化营商环境,势必挫伤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安全感,致使招商引资工作难以开展,最终也会让地方经济丧失活力。因此,必须充分信任和尊重企业家,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决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国家和社会掉入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的陷阱。

第二,从市场、企业和企业家层面看。既要做到守法经营,合法营利,依法纳税,更要在商言商,及时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法无禁止则行,因为只有企业经济搞好了,居民才能有就业,政府才能有税收,金融才能有依托,社会才能有保障。要牢固树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的价值准则,大力改变政商之间的主从关系,转变“找政府”和“跑关系”的发展模式,学会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由于企业家才是真正的要素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和创新推动者,因此,企业家必须引领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把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统一起来。与此同时,各种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和地方商会要代表企业利益,建立政府与企业沟通的制度化途径,降低沟通成本和提高沟通效率。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民营企业的桥梁和助手,既要依法行事,代表和维护企业

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要依法警示企业不法行为,维护社会利益,努力实现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辩证统一。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要科学把握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客观历史规律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层运演逻辑,必须对当代中西方在市场经济的本质界定、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资本权力化的主要路径等问题上出现的伦理视差进行探赜索隐,特别是对数字经济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运作面临的挑战予以仔细检审,才能最终归纳出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底线道德、伦理规则和法治原则。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靳凤林.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及其价值限度[J].理论视野,2011(10):33-36.
- [3] 杨玉成.两种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32.
- [4] 高永强.中国转型社会的政商关系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 [5] 魏德安.双重悖论[M].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

- [6] 玖田.脸书被曝泄露5000万用户信息[N].新民晚报,2018-03-21(A14).
- [7] 冯旺舟.资本的霸权与正义的诉求:21世纪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性探析[J].国外理论动态,2021(4):122-129.
- [8] 徐宏潇.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化特征及其批判进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4):140-147.
- [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2-01-21(1).
- [10] 蓝江,王欢.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J].求是学刊,2019(2):45-54.
- [11] 樊鹏,李妍.驯服技术巨头:反垄断行动的国家逻辑[J].文化纵横,2021(1):20-30.
- [12]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229.
- [13]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1.
- [14]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5] 徐进,李琳一.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J].文化纵横,2020(3):107-115.
- [16]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2.
- [17]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1-01(2).

The Moral and Legal Way to Standard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est

Jin Fenglin

Abstract: Since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two principles of “affinity and pur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in the new era in depth. Due to the different cogn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essence and role of market econom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capitalization of power are of the same quality, and the paths of capital empowerment are vastly different. Especial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 economic digitization,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ace more complex ethical challenges; in terms of capitalization of digital power, it presents various forms of expression. In terms of empowerment of digital capital, it has also generated various forms of express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deep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bottom line morality, ethical rules, a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of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est,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three major issues: ensure treating vulnerable groups with a proper attitude the moral premise of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continue to build an ethical rule system of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legal guarantee of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ffectively address and solve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China’s politics and business relations (power and 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a; the West;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the way of virtue and law

责任编辑:思 齐